

中国反封建思想 革命的一面镜子

《呐喊》《彷徨》《综合论》

• 王富仁 著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87
I210.97
235

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 的一面镜子

——《呐喊》《彷徨》综论

王富仁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405042

B



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

——《呐喊》《彷徨》综论

王富仁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固安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印张：15.75 字数：3850千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统一书号：10243·51 定价：3.00元

序

这是王富仁同志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大家觉得有出版的必要，要我写篇序，略为介绍。我开始感到有些为难，作为他的导师，较难说话。继而又想到：何不采用在他的“论文答辩会”上几位专家、教授对他的论文的“评语”和“答辩委员会”建议授予他博士学位的“决议”来写序呢？这比我个人的评价要全面和客观一些，同时也把我的“评语”写在最后，供读者参考。我就这样写下了这篇不象“序”的序。

不过我要说明的是：他的论文共有四章，全文很长，按论文答辩规定，可以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进行答辩；我们选取的是全文第一章《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论〈呐喊〉〈彷徨〉的思想意义》，包括全书“内容概述”在内，一共约有四万七千字，可以由一斑而窥全豹。

以下是“评语”和“决议”：

《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是一篇很有深度的学术论文。它从宏观的角度准确地考查了《呐喊》《彷徨》的历史内容和思想特质，科学地论证了鲁迅前期小说的重大价值首先在于它是中国思想革命的镜子。史料翔实，论述充分，角度新颖，分析精到，包含着很多深刻的独创性的见解，基本论断，令人信服。鲁迅小说研究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水平较高的领域，本文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

又有可喜的重要进展，澄清了过去一些论著从政治角度考察两本小说集所得到的与作品实际不尽相符的结论，从而带来了鲁迅小说研究上的某种新突破。不足之处在于：有些段落文字稍嫌粗糙，个别具体论断或提法尚可斟酌修改。

这篇论文的写作目的，是要在几十年来《呐喊》和《彷徨》研究已经取得的成就的上面，再进一步从“作者的主观意图与作品的客观效果、思想和艺术、内容和形式的内在有机联系中，对《呐喊》和《彷徨》的特证做一以贯之的有系统、有整体感的统一把握。”这是论文作者对论文写作提出的一个相当高的标准，是个难度较大的课题。

论文首先对于过去研究的“最高成果”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肯定了那个“研究系统帮助我们开掘了前此未经开掘的意义”，指出这一点是很必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指出了“这个研究系统”的“不足”，诸如“鲁迅小说研究与鲁迅前期思想研究的不协和性”，“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的彼此分离的二元观”等，都是这些年鲁迅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为此，作者想要“以一个更完备的系统来代替我们现有的研究系统。”作者说这是个“初步的尝试”，并且说“这个尝试可能是失败的，但这个尝试本身将会是有意义的。”我以为这个尝试是相当成功的。

这篇论文写得成功，主要在于作者实事求是地分析了鲁迅前期思想的实际情况和《呐喊》《彷徨》的实际内容，从而提出了自己的系统的见解。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作者对于鲁迅前期思想，诸如进化论、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等等，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突出地指出了“鲁迅前期思想与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资产阶级学说的本质差别”，指出了鲁迅前期思想的“深度”和“民族特色”。这些论证，是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是避免了片面性的。再一点很重要的是作者从

“思想革命”这一角度分析《呐喊》《彷徨》的思想内容，完全符合鲁迅前期思想的实际和小说创作的实际。作者说：《呐喊》和《彷徨》的整个布局，体现着中国“五四”思想革命的特定对象和任务——没有反帝题材的作品，对不觉悟群众的重点描绘，重视社会舆论的描写。”这样的看法是对的。鲁迅前期确实非常重视“思想革命”，而且是从思想革命出发从事小说创作的。鲁迅对中国的传统思想了解极深，对中国社会各阶层所受封建思想的影响的了解也特别深；他对于中国的封建势力，尤其是封建思想的势力，比一般“五四青年有更高的认识，所以，在他的笔下，劳动人民之不觉悟，封建势力之根深蒂固，都写得十分深刻，思想革命的艰巨性也写得非常充分。《呐喊》和《彷徨》的深刻性正在这里。作者说鲁迅“确实认真地思考了中国封建传统思想的性质和特性，并且对它的现实表现有深切的感受。”这看法是很对的。

此外，这篇论文对于鲁迅两部小说集的创作方法和艺术于法的阐释，也都言之成理；对于几十年来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诸如关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等，也都提出了自己的系统看法。

由于作者从鲁迅前期的思想实际和两部小说集的内容实际出发而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也就阐明了鲁迅创作思想的特点和作品的艺术特点，可以说，这篇论文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写作目的。

当然，在一系列的具体论证中，有的地方也还可以商榷；例如讲到“现实概括”和“历史概括”的“艺术手法”的时候说：“少量文言古语插入大量的白话语言中造成读者思路的轻微语言阻隔，把读者的思路从对现实具体事件的关注中暂时弹射出来，以建立与封建传统和封建历史一贯本质

的联系，是鲁迅加强读者古今联想艺术手段之一”云云，就不一定准确。鲁迅在大量的白话语言中插入少量的文言古语，其原意是否想要“造成读者思路的轻微阻隔……”，尚可进一步研究。

论文“答辩委员会”“关于建议授予王富仁中国现代文学鲁迅研究博士学位的决议”（六票一致通过）：

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呐喊》和《彷徨》进行了深入的、富有独创性的研究，取得了为学术界许多人所承认的突破性成果。他的研究工作表明，他已经达到了获得本学科博士学位的水平。因此，建议授予他中国现代文学鲁迅研究博士学位。

以下是我的“评语”：

从该生所写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的第一章和全文的《内容概述》看，他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新民主主义论》和他的文艺思想），并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涉及到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外国资产阶级的著名作家作品所表现的思想，论述了《呐喊》《彷徨》所表现的“五四”时代思想革命的意义；表现了作者能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中国“五四”实际相结合；能运用比较广博的中外历史、文学史和有关哲学的知识，从思想革命这个角度阐发了《呐喊》《彷徨》的革命意义。并且说明了这个思想革命是政治革命的折射，是政治革命的先决问题；没有进行好这个“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所以辛亥革命失败了。

着重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这个角度来评论《呐喊》《彷徨》，而不只是从社会政治意义上来评价它们；又从多方面细致深入地分析了两部小说集的所有作品，

有了充足的论证，在鲁迅研究界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是颇有创见的。而这是主要由于作者多年独立钻研业务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结果，导师的作用是很小的；这是实情，不是谦虚。

这篇论文是一九八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在“答辩委员会”上通过的。一年来，作者又依照大家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和加工，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缺点和错误也依然难免，尚待学术界继续研究、指正，以便这一研究课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李何林

1985年9月于北京，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之日。

目 录

序	李何林 (1)
引 论	1
第一章 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	
——论《呐喊》《彷徨》的 本体 意义	11
第二章 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锐利武器	
——论《呐喊》《彷徨》的 意识 本质	94
第三章 两种观念意识进行对话的基本艺术方式	
——论《呐喊》《彷徨》的 创作 方法	176
第四章 变动着的观念与变动着的艺术	
——论《呐喊》《彷徨》的 艺术 特征	271
第一节 环境与人物的两极对立	
——论《呐喊》《彷徨》的 环境 展现和人物塑造	272
第二节 两条因果链的辩证统一	
——论《呐喊》《彷徨》的 情节 和结构	356
第三节 喜剧与悲剧的复杂交织	
——论《呐喊》《彷徨》的 感情 格调	416
后 记	490

引 论

《呐喊》和《彷徨》的研究在整个鲁迅研究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都是最有成绩的部门，从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6卷6号发表了吴虞的《吃人与礼教》一文以来，在迄今为止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外鲁迅研究学者和其它各界人士发表了难以数计的文章，出版了大量论著，对《呐喊》和《彷徨》以及其中诸篇小说做了多侧面的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但如何在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与作品的客观社会效果，在思想与艺术、内容和形式的内在联系中对《呐喊》和《彷徨》的独立特征做一以贯之的有系统、有整体感的统一把握，至今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的课题。从五十年代开始，在我国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分析为纲、以对《呐喊》、《彷徨》客观政治意义的阐释为主体的粗具脉络的研究系统，标志着《呐喊》、《彷徨》研究的新时期，反映了我国解放后《呐喊》、《彷徨》研究在整体研究中取得的最高成果。这个研究系统帮助我们开掘了此前所未曾或较少开掘的思想意义，论证了《呐喊》和《彷徨》与中国民主主义政治革命斗争的内在有机联系，在较前远为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上衡定了《呐喊》和《彷徨》的思想艺术价值，在迄今为止的三十余年实际规定着我们对《呐喊》和《彷徨》的主要研究方向。但当这个研究系统帮助我们从中国政治革命的角度观察和分析了《呐喊》和《彷徨》的政治意义之后，也逐渐暴露出了它的不足。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发现，它与鲁迅的小说原作存在着一个偏离角。由于这个偏离角的存在，它所描摹出来的《呐喊》和《彷徨》的思想结构图式与我们在原作中实际看

到的在构架上发生了变形、在比重上有了变化。例如，在《阿Q正传》的艺术描写中处于次要地位的关于阿Q要求参加革命的描写，在我们的研究文章中被大大强化了，成了《阿Q正传》之所以成为伟大现实主义作品的主要标志，而在原作中用大量篇幅和主要笔墨加以表现的阿Q精神弱点的艺术描写，则无形中被降到了一个较次要的位置上来，并且常常被认为是鲁迅较多地看到人民的弱点的例证，做为鲁迅当时思想局限性之所在。与此同时，在对阿Q革命的分析中，其积极意义得到了片面的夸大，其消极意义只剩下了轻描淡写的几笔附赘之词。很显然，这与鲁迅原作的艺术构成在整体面貌上有了很大不同。这个偏离角发生的根源则在于，这个研究系统是以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民阶级在中国民主主义政治革命中的政治动向为纲来分析《呐喊》和《彷徨》关于农民阶级的艺术描写的，这样，便只能在从农民阶级革命性的首要前提下表现农民阶级所存在着的某些次要的、非主流的思想弱点，舍此则无法说明《呐喊》和《彷徨》的杰出思想意义。由于这个研究系统所描摹出来的《呐喊》和《彷徨》的思想内容的图式是一个变了形的思想图式，所以势必与鲁迅前期的实际思想产生不协和性的状况，有些地方甚而至于彼此牴牾。例如，在鲁迅前期思想研究中普遍承认的鲁迅的个性主义思想倾向，在鲁迅小说的研究中却做出了相反的说明，人们不但没有发现其中对个性主义、对个性解放的肯定，反而发现了对它们的批判和否定，鲁迅关于知识分子描写的深刻性常常被人们铸定在这种批判和否定的意义上。我们还能看到，在三十年间的研究过程中，这个系统始终未曾在思想与艺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联系中把《呐喊》和《彷徨》的艺术研究纳入到自己的研究系统中来，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的彼此分离的二元观仍然是这个研究系统的主导倾向。艺术和内容是彼此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的，特定的内容要求着特定的艺术，特定的艺术又固定和加强着特定的内容，二者在一个

完美的作品中只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原应是可以彼此过渡、相互说明的。思想研究的系统理应能够带动并组织起艺术的研究，将其主要的特点都从内容的表现方面得到适当的说明。这个研究系统之所以不能做到这一点，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变形了的思想图式再也难以与原作的艺术图式达到象在原作中那样契合无间的程度了。例如，当把对吕纬甫、涓生、子君、魏连殳等觉醒知识分子的批判强调到了不适当的地步、以致将此放到与对他们的肯定同等重要或更为重要的地步的时候，思想内容的分析便再也难以与这些篇章的浓重的悲剧性的艺术分析统一在一起了。

“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语），否定性的批判专注于人物自身便构不成人物自身的悲剧性内容。同样，假若我们把阿Q要求参加革命的描写做为对农民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政治认识的艺术肯定，这些章节的喜剧性质也便没有了内容上的依据。“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鲁迅语），本质意义上的巨大价值不可能构成鲜明的喜剧或笑剧的内容。《呐喊》、《彷徨》创作方法的研究在这个研究系统中基本上也是孤立存在的。毛泽东同志提出“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之前，我们几乎未曾发觉《呐喊》、《彷徨》中有什么明显的浪漫主义因素，只是在此之后，我们才开始认为它们与浪漫主义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姻缘。近年来，我们又重新肯定了其中的象征主义因素。显而易见，我们对它们的创作方法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文艺理论界对某种创作方法的肯定性评价或肯定性程度的高低为转移的，而较少从鲁迅当时的思想需要和艺术需要出发，说明它们的哪些需要决定了鲁迅必须采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又是哪些需要使他还必须在特定倾向上靠近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假若我们更严格地要求这个研究系统，便会发现它对我们更深入地研究中国现代政治史、思想史和鲁迅思想、鲁迅小说都有可能发生一些障碍。例如，按照这个研究系统的结论，中国共产党人在此后

数十年间用大量的鲜血换来的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规律的认识，似乎鲁迅在《呐喊》和《彷徨》中已经做了正面的、明确的艺术表现，这不能不相对降低了中国共产党人政治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和毛泽东同志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理论的伟大贡献。与此同时，它反过来又不利于鲁迅思想和鲁迅小说深刻社会意义的分析及其独立价值的评价，因为仅从这个角度衡量鲁迅思想和鲁迅小说的意义，其任何对中国政治革命规律的忽视都会降低它们的思想性的高度，而当毛泽东同志早已对这些规律做出了更明确、更完整、更精当的理论归纳之后，鲁迅思想和鲁迅小说便不存在任何意义了，剩下的只能是“艺术”、“技巧”和“手法”，思想的探索就此止步，思想家的鲁迅便终止了他的独立作用。这方面的弊病发生在这个研究系统的方法论上，它主要不是从《呐喊》和《彷徨》的独特个性出发，不是从研究这个个性与其它事物的多方面的本质联系中探讨它的思想意义，而是以另外一个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的独立思想体系去规范和评定这个独立的个性。这样这个个性体便必然以另一个个性体为标准、为极限，前者的意义是以符合后者的程度被标示出来的。这种研究方法只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是极大地提高了这个个性体的意义而使它达到与前者并驾齐驱的地步，这样势必便以前者代替了后者，降低了后者的独立意义和价值；二是永远把这个个性体严格限制在后者的包容之中，它的意义只能是后者的一部分或一局部，这样这个个性体便势必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当然，这绝非说不能从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的角度去研究和考察鲁迅的《呐喊》和《彷徨》，而是说这个研究系统基本上仅仅以此规定着它们的思想意义而相对忽略了它们的个性特征的研究。事物的意义主要在于它的个性的意义，在于它的个性总是与一般相联系而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个别的事物，在于它的个性所反映出来的普遍意义虽然经过转化而与另一个个性所反映出来的

普遍意义相联系,却绝对不会等同于另一个独立个性的普遍意义。鹿茸的价值不能以人参的价值来确定,电子计算机的作用不能用电视录象机的作用来评定,反之也是这样,虽然它们都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杰出意义不在于他提供了另一个伟大思想家或文学家所已经提供了的东西,而在于他提供了为任何人所未曾提供的东西,而在于他具有为他人所不可逾越的独立贡献。否则,他便只能是一个平庸的思想稗贩或文学工匠。总之,当《呐喊》和《彷徨》的这个研究系统已经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之后,当它已经发掘了它可能发掘的思想内涵之后,我们若继续自觉或不自觉地限制在这个研究系统之内,将不再有利于我们对《呐喊》和《彷徨》做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在这里,是一个整体的研究系统问题,而不是一个局部细节的问题,任何单从局部细节问题着眼而想纠正这个研究系统所带来的弊病的做法,都可能使我们从一个错误的结论走向另一个错误的结论。例如,近年来有些同志企图以鲁迅否认阿Q革命的结论来与原来鲁迅赞扬阿Q革命的结论相对立,这在局部研究中似乎也只能如此,但这个结论同样陷入了片面性。假若认为鲁迅对一个走投无路的农民企图通过革命的变动而改变自身命运的愿望也予以否定,实际与原来所说的阿Q革命反映着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的结论同样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因而我认为有必要调整我们《呐喊》和《彷徨》的研究系统,以一个较为完备的系统来代替我们现有的研究系统。这个研究系统不应当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具体规律的理论结论为纲,而应当首先以鲁迅当时的实际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为纲;它应当在鲁迅主观创作意图和《呐喊》、《彷徨》客观社会意义的统一把握中,以前者为出发点,以后者为前者的自然延伸和必然归宿,既要改变那种随意在鲁迅那里寻找各种不同思想理论的依据、随意团揉鲁迅及鲁迅小说的“纯客观意义”的分析方法,又要充分发掘鲁迅小说所可

能具有的、为鲁迅当时所没有直接意识到的客观思想意义，从而做到客观意义的分析不脱离鲁迅主观创作意图的基础，鲁迅主观创作意图的阐释不妨碍对它们的客观思想意义的进一步探讨，从而较正确地描摹出《呐喊》和《彷徨》自身所独具的基本思想图式；这个思想图式应当接受鲁迅前期思想实际状况的检验，应当在主要结构构架上同鲁迅杂文中所直接陈述的思想认识呈现出协和一致的状况，它不应当与鲁迅前期思想研究中得出的令人信服的正确结论发生抗拒力；而应当对鲁迅前期思想研究中可能出现的偏差有所矫正和补益；这个思想图式应当能够带动并组织起对《呐喊》和《彷徨》创作方法和艺术特征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说明如何由思想的需要产生了它们的艺术需要，而艺术需要又如何满足并加强了它的思想需要。它还应当能够说明，《呐喊》、《彷徨》的艺术优长如何在思想性的加强趋势中表现出来，而它的可能存在的艺术弱点又怎样在思想性的削弱趋势中表现着。在方法论上，它不应当以任何一个其它的具有独立个性的思想理论去规范和要求这一个独立的思想艺术个体，不应当让《呐喊》、《彷徨》的艺术表现仅仅做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得出的现成的、已有的结论的具体注脚，而应当严格从这个特殊的个体出发，从它的特性出发，着眼于它们的独立价值和意义，我们的任务只是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状况说明它们独特发现的真理性，而绝不能以之删去它们的独立意义和不可代替的独立价值。

本书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初步的尝试。

本书共分四章：第一章可以认为是《呐喊》和《彷徨》的本体论。在这一章里，我们首先考察《呐喊》和《彷徨》的作品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实际意义。这个意义，是社会现实在鲁迅思想观念中的反映，是鲁迅以自己独特的思想个性把握客观现实的结果，可以说，是客观与主观的交融，是内与外的化合，是注入着

鲁迅主观思想、感情和情绪的客观社会现实。而对于我们，它们则是不依研究者的主观意图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我们的任务是发现它们自身所呈现着的实际面貌，并尽可能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说明其独特的深刻思想内涵。在这一章里，我们将论证《呐喊》、《彷徨》不是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而是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角度来反映现实和描写生活的，它们首先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一系列问题是在这个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中被折射出来的；第二章可以认为是《呐喊》和《彷徨》的抽象本质论。任何一部艺术作品，都不可能是社会现实的纯客观记录，而是作家、艺术家以特定的观念意识自觉或不自觉筛选、提取、集中化、立体化了的社会现实，在这种客观事物主观化或主观感情、主观思想客观化的过程中，在客观与主观的交吻、渗透、化合的过程中，艺术作品以各种明显的或不明显的、直接的或非直接的方式体现着作家、艺术家创作这件艺术品时的意识本质。在这一章里，我们将探讨鲁迅当时是以怎样的观念意识观察现实和反映现实的。这里的问题将非常明显：假若鲁迅的《呐喊》、《彷徨》是中国社会政治革命规律的深刻反映，那么它们的意识本质就将是对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的深刻认识，而假若它们的意识本质只有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中才愈见其超群绝伦、深刻警拔，那么也就能够证明《呐喊》和《彷徨》主要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通过这一章的论述我们将说明，《呐喊》和《彷徨》所体现出来的鲁迅思想意识，与他在杂文中较为明确地表现出来的思想观念在整体上是一致的，这个思想观念深刻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思想意识的根本特征，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锐利武器。这种思想意识的先进性、革命性和深刻性，赋予了《呐喊》和《彷徨》反封建思想内容以先进性、革命性和深刻性。形象可以大于思想，但必须以一定思想做基础；创作方法可

以帮助作家超越某些世界观所造成的障碍；但它必须有更内在的意识本质做动力。鲁迅的《呐喊》和《彷徨》反映现实的深刻性，直接说明了鲁迅当时思想意识本质的先进性和深刻性，鲁迅前期以进化论、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为基本组成部分，以彼此制约、相互渗透的特定组合方式为基本构架所形成的独立思想观念，是与中国传统封建意识在各主要方面尖锐对立的现代中国的观念意识，否认这个思想的先进性和深刻性，必将导致对《呐喊》、《彷徨》杰出思想意义的否定；第三章是《呐喊》、《彷徨》的艺术方法论。多年来，我们都企图寻找一种绝对正确的、永远先进的、普遍有效的创作方法，但这种企图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和没有成效的。创作方法的优劣只能在与作家的独立个性，作家所要达到的主要创作目的相对应的关系中来确定，用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表达雪莱的浪漫主义激情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时，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便是一种粗笨的、不顺手的武器，反之亦然。《呐喊》和《彷徨》的创作方法的特征是与它们所要达到的思想艺术目的相吻合的，否则，它们便不会成为杰出的艺术品。在这一章里，我们分析鲁迅《呐喊》和《彷徨》创作方法的特征与它们的反封建思想内容的内在有机联系，说明它们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各自与鲁迅的何种思想需要联系着？它们各建立在鲁迅当时的何种思想观念的本质？第四章是《呐喊》、《彷徨》的艺术特征论。艺术特征与思想特征是交融在一起的统一体，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完善的创作方法，也不存在绝对完善的艺术技巧，艺术形式的完善与否以及完善的程度，只有在与特定内容的关系中去寻找，二者相谐和的程度便是艺术技巧、艺术形式完善的程度。在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中，我们完全可以从它的艺术特征发现它思想内涵的特征，也可以循由它的思想特征发现它的艺术特征。在这一章里，我们将分析《呐喊》和《彷徨》的艺术特征是怎样在反映中